

法光如學禪師相關研究之探討（二）

釋禪慧



1990年12月25日如學禪師帶領法光佛研所師生拜訪印順導師，日本知名學者鎌田茂雄（坐前排左二）、阿含學者楊郁文等隨行。
（取材自《恆清法師訪談錄》）

（二）如學禪師稱號質疑

江燦騰教授對於如學「禪師」二字的稱號，他質疑「稱『釋如學』為『禪師』，實際上有點名不實。」¹臺大哲學系教授恆清法師因擔任法光佛研所所長，將近3年的時間，與創辦人如學師父近距離接觸、共事，師父負責經濟支援，所長負責教學，聘請優秀師資，指導學生研究。從做人處事，各種工作中，「她致力於弘化和栽培弟子，她以在日本學得的曹洞宗『只管打坐』的禪法，教導信眾如何『照顧足下』，她既犀利又柔順的禪風，使她贏得『禪師』的美名。」²以上是恆清法師眼中的法光佛研所創辦人如學禪師之所以被尊稱為「禪師」之由。

佛教講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，世間一般做學問的人，不一定言行相應，但如果是佛法修行，不只「信」仰理「解」，「解行」一定要「相應」，解行要相應，不光是能說善道、嘴巴說說而已。尤其是禪的修行，是在日常生活中來體現，日用中每做一件事，不分大小，喜歡與否，每一件事都是對修行的考驗，都要把它當作

修行。

筆者在〈修行與做學問〉、〈如學道宗一代禪師〉、〈從《祇園正儀》看芙蓉道楷的修行觀〉³等文中提到，所謂「解行相應」——學德兼優，行學一如，內外一如，這些都是禪佛教的要求，也就是說禪佛教的修行是要說到做到。以出家人來講，不管你稱他禪師、法師都好，除了精通佛法義理之外，如果缺少了真修實證，那就不足以被稱為禪師或法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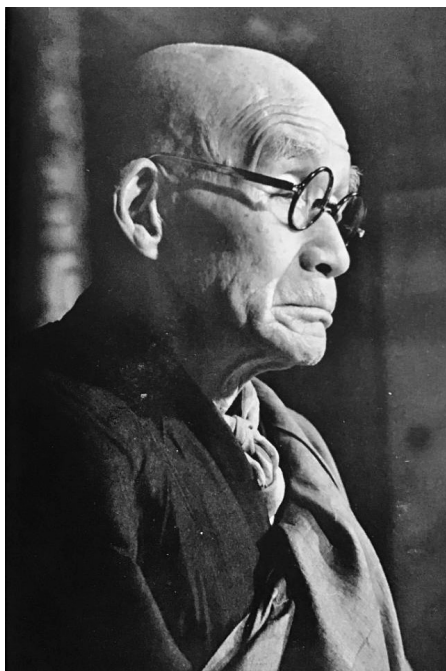
金子大榮先生（1881～1976）說過：「不只是釋尊，所有有緣的善知識都是應現的佛陀，應化身的佛陀。」⁴筆者年輕初學佛時，曾經到白河大仙寺親近過大崗山派的開參老和尚，那時他老已經半隱退，經常在後山做一些修補庭院、照顧花草樹木的工作。他是個樸實無華、不太說話的師父，不管工作或休息對他而言都是修行，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心常在定的老修行，任何時候他總是給人溫和慈祥，如沐春風的感覺。雖然沒有高深學問，木訥寡言，但即之也溫，無言的身教，總是令人法喜充滿，如在「禪悅」中，這是語言文字難以形容的。這位老和尚不簡單啊，中國佛教會遷臺後，民國42年（1953）第一次三壇大戒傳戒，就是

在他老主持的大仙寺舉辦。

記得六〇年代，前泰北中學校長、臺大教授李添春先生（1899～1988），請如學師父去基隆主持道元禪七，李教授雖是如學上人之學長，但每次見面仍口口聲聲稱家師「禪師」。法師或禪師、大師、導師等稱呼，也只是世間名相，讓人易於認識而已。至於合適與否，要看站在什麼立場，相信每個人心中有數。眾所周知，臺灣佛教界在領導人方面，佛光山提出了「大師」的尊號於星雲；慈濟也相對的賦予證嚴「上人」的稱號；華梵亦以「導師」來尊崇曉雲；中台山也宣揚惟覺法師有特殊魅力。「上人」、「導師」、「大師」皆是方便攝化眾生，本是四眾弟子對福德長老之崇仰而起，固無不可，但亦可從此看出弟子對僧團領袖向心力之標幟。⁵

法光如學師父留日時，她的老師也是她的傳法師父——澤木興道老師，是日本道元禪實踐派的禪僧，跟臨濟宗出身的鈴木大拙博士，兩人風格完全不同。如學師父既然是澤木興道老師的弟子，很自然的，她的做人處事也跟老師非常的接近。

我寫〈如學道宗一代禪師〉主要說明，師父在碧山岩時期一直到八七大水災，歷經重重考驗，



澤木興道禪師在東京三田參禪道場連續指導坐禪15年，1962年10月留影。
（取材自《澤木興道全集》第四卷）

愈挫愈勇，將近15年的叢林期，重點在教育弟子、培訓弟子。到了臺北法光寺時期，「鬧市叢中作道場」，經常會見高官顯要，看似簡單卻非容易，佛說「富貴學道難」，因為有權有勢者，要讓他們自動來親近三寶，簡直比登天還難，但在商界或政治圈子裡，有很多時候也很無奈，佛法如甘露可以滋潤眾生枯萎之心田。師父跟信眾接觸開示，是活生生的在轉法輪度眾生，如同佛世及今南傳佛教僧侶，出門托鉢時對信眾方便說法，出家人法施，在家人財施是也。所謂「大隱隱于市，小隱隱于山」，能在五濁惡世弘化而不被眾生度走，在滾滾紅塵中不被同化或變質，這才是真功夫！才不愧為

「一代禪師」。

或許有人認為，道元當年赴宋留學即將回國時，如淨禪師交代，不要住在人多吵雜的地方，也不要親近權勢豪門，隱居深山幽谷，接得一個、半個真正有道心者就夠了。如學禪師既是道元禪之傳承者，卻與政商界人物往來，豈不與道元禪師之家風背道而馳？

道元出身皇族貴胄，不必刻意迎逢權貴，其一生修行最忌與王權往來，珍惜羽毛，幾乎到了潔癖的地步。然佛法出現世間乃為利樂眾生，從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，特別是大乘佛教乃針對普羅大眾，在家弟子之教化。不論出家與否，修行之最終目的，自覺覺他，自利利他，缺一不可。

釋尊捨太子之尊榮，放棄王位繼承，倡導眾生平等。戒律明言，禁止出家人涉及政治有關人事、物，《法華經安樂行品十四》：「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官長。」在重頌中接著又說：「在於閒處，修攝其心，安住不動，如須彌山。觀一切法，皆無所有，猶如虛空，無有堅固。不生不出，不動不退，常住一相，是名近處。若有比丘，於我滅後，入是行處，及親近處，說斯經時，無有怯弱。菩薩有時，入於靜室，以正憶念，

隨義觀法，從禪定起，為諸國王，王子臣民，婆羅門等，開化演暢，說斯經典，其心安隱，無有怯弱。」⁶修行用功到了一個階段之後，從山林佛教邁向都會佛教，這才是真正功夫考驗的開始！

不得自動或主動攀附、攀緣權貴，並不代表不可與之接觸往來。對任何道場而言，往來者形形色色，你能加以設限、拒絕嗎？修行者本身只能自我要求，否則談何弘法利生？實際上王臣等護持宗教，對正法之弘揚，不僅印度、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等，歷朝歷代所在都有。在印度，如佛世摩揭陀國之頻婆娑羅王、憍薩羅國之波斯匿王，歷史上有名的戒日王、阿育王、迦膩色迦王等，廣為人知。玄奘大師《大唐西域記》屈支國（舊龜茲）條曰：「常以月十五、晦日，國王、大臣圖謀國事，訪及高僧，然後宣佈。」佛教史上，政界人物拜訪佛教或婆羅門教有道之士，商討國是，不在少數⁷。可見根本問題在尺寸之拿捏，須有大智慧、判斷力才不致引火上身，招來禍患。

三、法光如學與駒澤大學

「法光道宗」是家師日本道元禪師下之內外號，「如學」二字是臺灣曹洞宗法雲覺力派下之法號。「法光寺」即因師父法號而得名。

有人質疑，如學法師如果真的是日本駒澤大學畢業的高材生，為什麼她沒有留下什麼著作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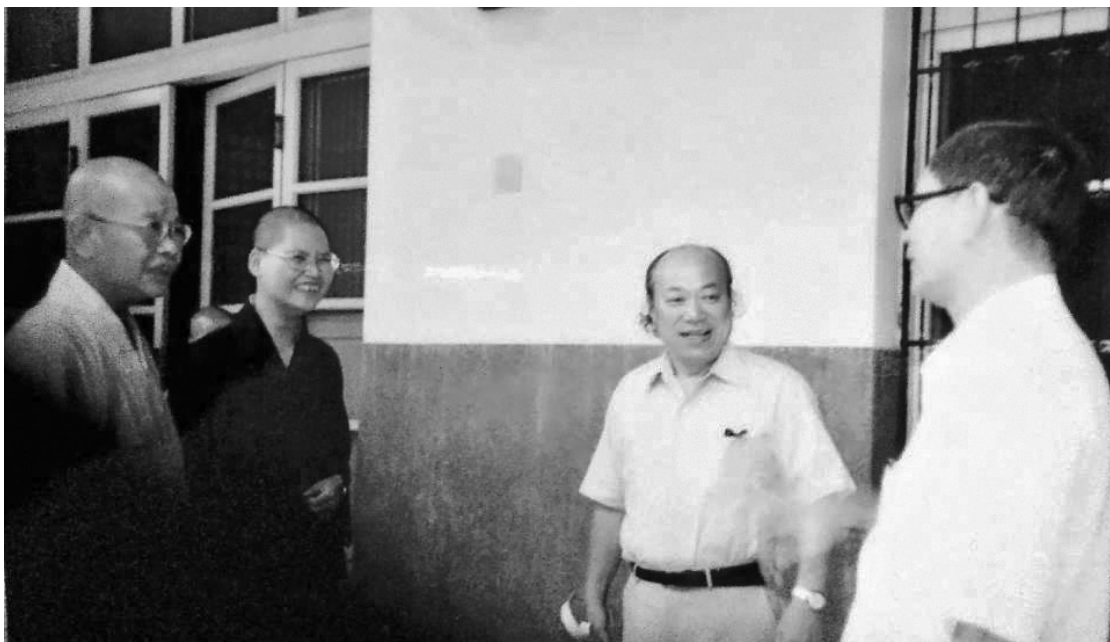
乍聽之下，不禁有點啼笑皆非。

日本奈良佛教時代，法相宗的祖師之一行基菩薩，他是日本第一位「大僧正」，也是東大寺大佛之開眼導師。一生興教修福，開墾荒地，建橋樑、築道路、港灣，設施藥院，濟貧醫病，不可勝數，人稱「菩薩」，普受朝野歸敬，但直到八十歲圓寂，沒有留下一篇著作或一首偈頌。

同一時代從中國到日本弘傳戒律，建立戒壇的鑑真律師（688～763），歷經五次失敗，不因失明而退縮，到第六次終於成功抵達日本。他的傳記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是弟子為他所寫。他和行基一樣，一篇著作也無。不以文字而以實際行動影響世人、貢獻社會的，不分古今，在吾等身邊所在都有。

曾經出國留學而沒有留下著作的人太多了，何止家師一人。古云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這要看每個人對人生的選擇，不能一概而論。特別是禪的修行，所謂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」，也就是說不侷限於語言、文字，禪之活潑不離當下，不離生活，俯拾皆是。

臺灣是個注重學歷的社會，但除了學歷外，應



中國佛教史、華嚴學權威鎌田茂雄先生（右二）1983年夏來臺作田野調查時，與臺北法光寺如學住持（左一）、禪慧法師（左二）、楊白衣博士（右一）等留影。

該沒有人會否認人生的經歷與辦事的能力同樣重要。有的父母只要孩子把書念好，其餘可以不管。處在瞬息萬變的時代，不斷的吸收新知充實自己是必須的。光有高學歷而無各種歷練、磨練，如何承擔大責重任！因此學歷不是絕對的。常見不少「生活白癡」，舌燦蓮花，但除了會唸書、考試外，生活無法自理，更缺乏與人溝通及應變的能力。

如學師父在昭和12年（1937）考入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科。她最先在「關西尼禪林」五年制的專科學林，後來老師告訴她，妳是高女畢業的，依妳的條件，可以去投考駒澤大學，所以就轉到東京去考駒澤大學，入學時從三年級唸起。昭和15年（1940）畢業於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科，可以參考大野育子碩論《日治時期臺灣佛教菁英的崛起與曹洞宗》頁173~174。筆者在〈駒澤大學臺灣同窗會員略談〉中亦有相關之介紹。

駒澤大學有歷代、歷屆畢業生的名冊，佛教學部、文學部的學生，畢業以前都要提出畢業論文，在駒澤大學發行的學報都可以查得到。其它科系的不在此限。2013年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王宣蘋碩論附錄頁110，留學日本尼僧的個人資料，第二位就談到如學師父。

如學師父（張綉月）駒澤大學的畢業證書，八七大

水災時被洪水沖走了。我在1982年1月到日本時，奉師父之命第一件事就是到學校的留學生有關部門，替師父申請補發駒大的畢業證書。這一件事是我本人親自辦理的。⁹

前東京大學、駒澤大學教授鎌田茂雄先生（Kamata Shigeo，1927～2001），經常寒暑假到臺灣或中國，做中國佛教、臺灣佛教的田野調查。如果到臺北，一定到法光寺來，他跟師父是駒大的校友，在臺灣做田野調查，有很多語言、文化上的障礙，師父會派幾位會講日語或是留學過日本的弟子做他的嚮導、助手。當年我也曾經幫過鎌田教授做田野調查。鎌田茂雄教授有一本研究中國佛教很有名的書，叫做《中國的佛教儀禮》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），16K，很大一本，像磚塊那樣又厚又重。他在該書序言，曾談到家師及末學師兄弟等對他田野調查的協助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

1. 江燦騰，《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》，臺北：東大圖書，2003年，頁220。
2. 《恒清法師訪談錄》，國史館出版，2007年，頁117下。
3. 釋禪慧，《紅塵無處不道場》，臺北：三慧講堂，2018年。
4. 金子大榮，《佛教概論》，金子大榮著作集第一卷，日本：春秋社，頁253。

5. 釋惠空，《臺灣佛教發展脈絡與展望》，臺中：太平慈光寺，2013年，頁119。

6. 《大正藏》9冊，頁37。

7. 中村元，《東洋人の思惟方法1》，中村元選集第一卷第二編第九節，日本：春秋社，1978年，頁140～151。

8. 大野育子，「以曹洞宗駒澤大學為研究中心」，《日治時期臺灣佛教菁英的崛起與曹洞宗》，1999年，頁173～174。

9. 釋禪慧，〈家師與家書〉，《八月桂花香》，臺北：三慧講堂，2018年，頁190。

更正啟事

頃接禪光法師函示，《海潮音》第104卷第

2期〈法光如學禪師相關研究之探討（一）〉：

1. 頁18下第12行「智光禪寺先後傳於禪光、禪峯……」。

2. 頁19上第一行及頁24下第一行「臺美」改「中美」。

3. 頁24上第二行「住持」改「開山住持」。

4. 頁24下第10、11行「禪帆、禪林、禪馨、禪化」刪除。

又、禪慧按：同上〈法光如學禪師相關研究之探討（一）〉頁23第20行「禪峯」下面加（智光禪寺住持）。

禪 慧 合 十